

蘇聯的先進歷史科學

劉大年

蘇維埃的歷史科學，是蘇聯共產主義建設事業中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任務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所闡發的社會發展規律的具體歷史知識充實蘇聯人民，幫助他們勝利地向共產主義前進。

歷史科學在蘇維埃國家裏不是一門可有可無的學問，它被認為在社會科學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蘇聯史學家指出：只有當人們認識了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質，認識了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在歷史上滅亡，社會主義制度必然成長的規律，認識了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規律，才能夠更好地為共產主義事業進行始終不懈的鬥爭。列寧教導我們：“為要獲得勝利，就必須懂得舊資產階級世界底全部深刻歷史。”（“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 682 頁）歷史科學的作用就正在於此。

和蘇聯其他各門科學工作一樣，蘇聯的歷史科學工作擁有一支龐大的隊伍。它同蘇聯的哲學、經濟學、語言學等科學研究部門一起，組成爲一支無比強大，在全世界最有權威的社會科學大軍。

由於蘇維埃政府、黨和斯大林本人的經常關懷，蘇聯歷史科學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蘇維埃政府成立的最初若干年中，蘇聯史學家就給了資產階級歷史學一系列的致命打擊。在歷史學方面宣傳取消主義觀點的波克羅夫斯基反馬克思主義唯心學派的被迅速清算，保證了蘇聯歷史科學的健康發展。1934 年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諾夫所提出的“對蘇聯歷史教科書綱要的意見”和這以後斯大林的經典著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出版，給予蘇聯史學界以極大的鼓舞。蘇聯學者以這些指示和經典為依據，創作了不少的重新說明人類許多重要歷史問題的著作。衛國戰爭以後的年代裏，蘇聯的歷史研究工作繼續發展，特別是斯大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和“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先後發表，推動了蘇聯歷史科學大踏步地前進。蘇聯史學界對這些著作展開了深入的討論和研究。他們根據着斯大林著作中的思想檢查過去的工作，重新提出許多的迫切需要研究的問題。到目前為止，蘇聯史學家已經有 50 種以上的在歷史科學領域開闢了新道路的歷史著作榮獲斯大林獎金。大學用的歷史教科書印行 10—20 萬冊，中學用的教材印行在 100 萬冊以上。這些歷史書籍在廣大讀者中起着積極的作用。

我們在這次訪問過程中，從蘇聯科學院歷史學哲學部的各研究所，烏克蘭、烏茲別克共和國科學院的歷史研究所，莫斯科大學、列寧格勒大學及其他大學的歷史學系或東方學系的教研室裏，看到它們的工作計劃中列有極其廣泛的研究題目。這些題目中有許多卷的蘇聯通史，蘇維埃時期史，蘇聯境內各民族史；有蘇聯歷史方面的各種專題：如莫斯科城市史，列寧格勒城市史，俄國古代史，俄國封建制度史，俄國農民史，俄國工人階級史，蘇聯自然科學史，蘇聯哲學史等等。這些題目中也多有卷的世界通史，世界近代、現代史，各人民民主國家史，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史；有東方各國史和世界史中的各種專題：如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史，英國、美國侵略亞洲史等等。可以說，從原始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從西方到東方，從自然科學史到哲學史，都是蘇聯史學界有計劃、有系統的研究的對象。在我們看來，蘇聯的史學研究工作實在是歷史科學上一條無所不包的戰線。

蘇聯歷史科學成就中表現得最突出的，是蘇聯史學家在斯大林的親自指導下，經過長期的深入研究和反覆爭論之後，傑出地解決了蘇聯歷史上的許多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很重要的，帶有根本性質的。

例如關於俄羅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的問題，在蘇聯史學界有過長期的討論。以往資產階級的歷史學一向用“羅斯(Русь)起源”問題來代替俄羅斯(Россия)部族的形成問題(按：Русь、Россия 有人一律譯為俄羅斯，在元史和東華錄上各有不同的譯法，現據目前一般出版物上通用的譯名，加以區別)，把羅斯人和斯拉夫人對立起來，描寫羅斯人是外來人、侵略者和斯拉夫國家的創造者，造成俄羅斯民族形成與發展問題上的極大的混亂。蘇聯史學家根據斯大林的民族問題理論，特別是根據“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提出的理論研究了這個問題的結果，完全粉碎了資產階級歷史學的偽科學論證。依照斯大林的指示，從氏族(Род)、部落(Племя)、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到民族(Нация)，是人類共同體發展的主要階段的順序。這幾個階段的區別是很清楚的。氏族和部落是作為原始公社的特徵的社會組織；部族是部落形成以後，民族形成以前，歷史上形成的人們的共同體；民族則是與資本主義的出現有關的產物。從部落到部族的過程中，還可以劃分出部落聯盟(Союз Племян)這樣一種過渡性的組織。部落聯盟是部族的基礎和最初的形式，但是部落聯盟轉化為國家，而部落集團則轉化為部族。國家是政治組織，部族則是歷史上一定階段的人們的共同體，兩者有聯系，但並不是一件事。

根據上面這些區別，蘇聯史學家對於從基輔羅斯起源的一些有關部落、部落聯盟以及俄羅斯部族發展的極其錯綜複雜的歷史過程作了詳細的研究，然後得出結論：古代基輔羅斯是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等民族的歷史搖籃。在6—7世紀時，包括羅斯和東方斯拉夫部落的俄羅斯部落聯盟就形成了。俄羅斯部落聯盟是一個長久堅固的組織，它有着傳播很廣的共同文化，執行了初步集結東方斯拉夫部落和防禦游牧人入侵的重要職能；並且同化了許多異族部落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到了9世紀，俄羅斯地域這一概念擴大了，古代俄羅斯國家範圍以內的一切東方斯拉夫部落的土地，被稱為俄羅斯的土地。具有統一的語言和統一的文化的古代俄羅斯部族就是在這個時候形成的。其中包含有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的祖先。古代俄羅斯部族內部的統一直到封建時代都是維持着的，只有在蒙古的征服

和隨之而來的俄羅斯部族的個別部分在政治上分離以後，才在大約14世紀的時候，從統一的俄羅斯部族中分出一些後來是獨立的民族來，這就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大俄羅斯民族。在這裏，人們看到了一個不大的羅斯部落逐漸走向俄羅斯部落聯盟的情況，也看到了把部落集團轉化為部族、民族以及看到把部落聯盟轉化為歐洲一個最大的國家的情況。資產階級的歷史學把羅斯人和斯拉夫人說成好像是兩個對立的民族，只是表現了資產階級歷史學者對於民族歷史發展的具體過程完全無知。

再例如關於俄國歷史上的前封建時期和封建時期的問題，也得到了解決。在俄國中世紀的社會歷史上，這樣一種意見被認為是正確的，即斯拉夫人像其他參加破壞奴隸制度的民族一樣，他們知道奴隸制度，但是越過奴隸制度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創造了封建制度。當然，如果認為封建制度是一下子在原始公社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那又是錯誤的。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諾夫在對蘇聯歷史教科書提綱的意見中提出了前封建時期和封建時期的區別這個概念；並指出劃分這個時期的一個主要標誌，乃是在前封建時期“農民還未被變成農奴”(“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人民出版社本340頁)。蘇聯史學家認為這個意見是反映了斯大林關於歷史過程中的過渡時期的思想。斯大林在其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提綱“論黨在民族問題上的當前任務”中，提供過一個範例，說明必須怎樣應用馬克思主義關於各種社會經濟結構的學說，來研究各民族的具體歷史。在這個提綱裏，斯大林指出在十月革命以前的土耳其斯坦、阿塞拜疆的大部分、達格斯坦、山地人、塔塔爾人、巴什基爾人和吉爾吉斯人的社會制度，是“半宗法制一半封建制”，“宗法封建制”。也就是說，這些民族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從宗法封建制度過渡到了社會主義社會。

蘇聯史學家根據斯大林的指示，研究了有關俄國封建制度的大量材料，現在已經可以判明：在5世紀以前，斯拉夫人過着高度發展階段的氏族制度生活。6—7世紀時，已有土地私有制度的存在，剝削別人勞動的特權階級的產生也應列入這個時期。到9世紀時俄國有了農奴的存在，有了順利地發展着的封建關係。10—11世紀俄國

的封建關係達到了完全成熟的時期。這樣就可以去推論，6—8世紀大體上是前封建制度到封建制度的過渡時期。最近去世的蘇聯科學院院士葛列科夫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他的包括17世紀以前的俄國封建經濟制度的“古代俄羅斯的農民”一書裏，確切地指出了農民成為農奴的過程。

在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過程中，曾有一些不正確的意見分別受到了批評。比方有一種意見，企圖用各種超經濟的強制因素來解釋俄國封建制度的形成過程。按照這種解釋，就彷彿不是封建所有制決定封建國家的發生與發展，相反的，是封建國家創造了封建所有制。這是誇大了上層建築的作用，把封建國家與超經濟的強制作用和封建關係的本身完全弄顛倒了。另外也有一種意見，主張根據地租的形態來劃分封建制度的歷史時期。地租形態的變更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把封建社會的全部歷史過程看作是地租形態變化的結果，那必然會對上層建築的意義估計不足，發生離開馬克思主義，走向經濟唯物論的危險。特別是對前封建時期和封建時期的劃分，地租形態不能作為唯一的一種標誌，因為在這裏是要分析生產方式的各個方面，分析封建剝削與前封建剝削的性質，而地租形態的變化則基本上是在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上進行的。

又例如關於彼得大帝時代（在位期間1682—1725）的俄國社會制度問題，蘇聯史學家曾在一個長時間內不斷地討論應當怎樣從社會經濟結構的學說底觀點去理解彼得的時代。一開始就有兩種見解，一種見解認為彼得時代的工廠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就是說當時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制度。另一種見解否定上面的說法，把俄國資本主義手工工廠的出現，推延到18世紀後半期，也就是說，彼得時代是只有某些資本主義成分的封建時代。其實斯大林早在1931年與德國作家劉第維赫的談話中就對這個問題發表了重要的意見。他說：“彼得大帝確實為提拔地主階級和發展新起商人階級而作過許多事情。彼得為創立和鞏固地主商人底民族國家而作過很多事情。同時也應該說，提拔地主階級，促進新起商人階級以及鞏固這兩個階級底民族國家，是靠拼命剝削農奴血汗進行的。”（斯大林：“論列寧”人民出版社本49頁）

斯大林着重講到封建社會制度下的兩個對立的基本階級——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但在講到商業資本家的時候，說它是“新起”的階級，而又完全沒有講到工人。這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是怎樣地觀察彼得時代的。

依照斯大林的啓示，蘇聯史學家研究的結果表明：17—18世紀俄國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並不多，當時的封建農奴制度佔着絕對的優勢；商品生產的活動範圍遠沒有獲得像資本主義制度下那樣普遍存在；勞動力沒有變成商品；封建土地所有制沒有動搖，並且對日益成長的資本主義手工工場起着阻碍的作用。直到18世紀末期手工工場才在數量上獲得增加，開始轉而影響了封建農奴制度的基礎。到了19世紀前半期，手工工場已經廣泛發展，加速了對封建經濟基礎的瓦解。1861年農奴制度的廢除，是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在俄國開始確立的標誌。從這時起，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代替了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但是甚至這一代替，也不會使生產關係完全適合於生產力的性質，農奴制度的殘餘，如大地主封建莊園的存在，專制制度等，都阻礙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且使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成為不可避免。因此，彼得時代是只有某些資本主義成分的封建時代，這是十分明顯的。

除此以外，蘇聯史學家們也還解決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對於蘇聯歷史研究工作的進一步發展有很大的作用。

前面說過，蘇聯歷史科學的研究範圍是極其廣泛的，它包括着歷史學領域的各個方面。應該說明，這絲毫也不意味着，先進的蘇聯歷史研究工作的方向，就是在所有一切方面平均使用力量，對所有一切研究題目都是同等看待的。

據蘇聯歷史學家介紹的情況和我們直接見到的一些材料，說明蘇聯史學家首先是把研究蘇聯現代史，研究世界近代、現代史作為他們當前最迫切的任務。

蘇維埃社會的歷史，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從剝削者手中解放出來，進行了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並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勝利地進行共產主義建設的第一個社會的歷史。研究蘇聯現代史，即研究蘇維埃社會的歷史，是要闡明社會主義社會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概括蘇聯人民為爭

取建立和鞏固蘇維埃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的偉大的歷史經驗。這對於蘇聯人民，對於世界各地正在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鬥爭的進步力量，都有着巨大的現實意義。正因如此，蘇聯史學家們以研究蘇維埃社會的歷史而自豪。他們引證列寧在1921年說過的一段話來表達出這一思想：“我們有權自豪，而且我們正在自豪：我們居然這樣幸運，開始來建設蘇維埃國家，因之開始了全世界歷史的新時代，也就是開始了新階級的統治時代，這個階級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是被壓迫的，而現今到處都在向着新生活，向着戰勝資產階級，向着無產階級專政，向着把人類從資本桎梏，從帝國主義戰爭中永遠解脫出來的目標邁進。”（“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906頁）事實就是這樣，今天對於歷史科學來說，再也沒有什麼比研究蘇維埃社會的歷史更為重要，更為光榮的任務了。

蘇維埃時期史中的許多根本問題，例如關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共產黨、蘇維埃國家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中和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建設中的作用；工人階級怎樣從一個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創造者和組織者階級，工人階級在蘇維埃社會中的地位；蘇聯國家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實現的過程；蘇維埃的文化革命與蘇維埃民主的發展；蘇維埃社會發展的基本經濟規律性以及蘇維埃對外政策、科學、文化、藝術發展的歷史等等，都是蘇聯學者所注意研究的題目。

與研究蘇維埃史的同時，蘇聯學者認為應該着重研究世界近代、現代史。其中包括各人民民主國家革命鬥爭史，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史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近代、現代的歷史。他們認為研究世界史的重要性，除了揭露資本主義國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分別地闡發各國革命人民鬥爭的歷史經驗，還在於幫助人們從蘇聯史與世界史的聯系中來看蘇聯史，了解蘇聯在世界上的歷史作用，了解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國際意義。同時，其重要性也還在於全面地闡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走向日暮途窮的歷史。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社會主義體系日益壯大，資本主義體系日益末落；並迫近最後地死亡，這就是近代世界歷史發展的根本

規律。

研究社會主義民族形成的過程，研究蘇聯境內各兄弟民族的歷史，被認為是蘇維埃歷史科學的另一個重要的任務。這不僅因為蘇聯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還因為這許多民族早已由資本主義民族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主義民族。

蘇聯學者根據斯大林的民族問題理論指出：蘇聯的社會主義民族是在推翻俄國資本主義，確立了蘇維埃制度以後，在舊的資產階級的民族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蘇聯的這些新的社會主義民族無論是它們的階級成分，它們的社會政治利益和意圖，都根本不同於舊的資產階級民族。它們擺脫了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有着資產階級民族所不能比擬的民族團結和全民的性質。資產階級民族思想的特色是民族之間的敵視與猜疑，而社會主義民族發展的基礎則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各族人民之間的友誼、合作的思想。正如馬林科夫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所強調指出的：“社會主義的敵人不能了解，由於偉大的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結果，我國各族人民，已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以一種堅固的友誼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我們的黨，堅持不渝地奉行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鞏固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發展蘇聯各族人民之間的友誼和互相合作，在各方面支持、保障和鼓勵我國各族人民文化的進步，並對所有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分子進行不調和的鬥爭。”（人民出版社本74頁）蘇維埃國家各民族興旺發展的歷史，是各民族平等與合作的真正範例。它表現了在民族問題上共產黨的政策和列寧、斯大林思想的完全勝利。蘇聯史學家的任務，是要根據大量的材料來闡明社會主義民族形成，發展的過程以及它所具有的歷史特點，來教育蘇聯人民。

這樣一些題目，如俄羅斯人民在蘇聯各族人民大家庭中的主導作用；先進的俄國文化和俄國工人運動對蘇聯各族人民的文化發展與解放鬥爭的影響；非俄羅斯民族合併入俄羅斯的進步意義等等，都是蘇聯學者認為須要着重研究的。

說到這裏，應該特別提到，蘇聯史學家很強調研究非俄羅斯民族與俄羅斯民族的歷史關係，研究民族運動的歷史時，必須注意反對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理由

是大家都知道的，馬克思主義要求用階級原則作為理解民族問題歷史的依據。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階級在鬥爭舞台上出現，每一個階級都按照自己的意思來理解民族問題。因而民族問題便在不同時代服務於不同的利益，帶上了不同的色彩。這種色彩是依照什麼階級和在什麼時候把問題提出來為轉移的。斯大林指示我們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無疑地具有的革命性，也正與某些個別民族運動底可能反動性一樣，都是相對的和特殊的。”（“列寧主義問題”80—81頁）因此，歷史學家研究民族問題時，必須直接地和發生這些運動的那一時期階級鬥爭的發展聯繫起來。這就需要根據具體的歷史條件進行具體分析。按照任何抽象的公式或是歷史類比的方法提出問題，都不能說明歷史真相；並且那也是資產階級思想最好的藏身之所。

蘇維埃的歷史科學自然也還需要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研究蘇聯封建制度及其以前的歷史。例如關於封建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封建制度下商品生產的作用，俄羅斯的封建土地佔有制度等等，都是蘇聯史學家認為應該繼續深入研究的問題。

首先研究蘇維埃社會史，研究世界近代、現代史；其次是研究蘇聯各民族的歷史；再其次研究封建制度及其以前的歷史——這就是目前蘇聯歷史研究工作的方向。1953年3月間，蘇聯科學院主席團曾專門討論了歷史研究所的工作，作出決定，並對上述方向作了說明。同時，也指出了過去工作中的缺點，認為歷史研究所集中了主要力量來研究封建制度的問題，沒有保證完成蘇維埃時期史，世界近代、現代史，人民民主國家史等方面的研究任務，這是不對的。

先進的蘇聯歷史科學的巨大成就，毫無疑問，是和蘇聯史學家具有高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這一重要事實分不開的。蘇維埃歷史科學最顯著的特色，是豐富的實際材料與高度的理論綜合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蘇聯學者告訴我們：歷史發展的規律是通過無數的具體事實表現出來的，研究歷史首先必須

詳細地佔有歷史資料。1934年聯共（布）中央發佈的關於教授本國歷史問題的決議，指示蘇聯史學家應該怎樣進行工作。這個決議中指出：按照歷史年代的順序講述歷史事件，使學生牢固地記憶着一些重要的歷史現象、歷史人物和年月日等，是學生們能夠切實領悟歷史課程的決定的條件。只有這樣的歷史教程，才能做到明確、具體、保證學生對歷史課程容易理解。也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正確的和正確的總結歷史事件才成為可能。要反對用一些社會經濟形態的抽象的定義，代替對本國史的有系統的講述。對於歷史教學是應該這樣做的，同樣地，對於歷史研究也應該這樣做。但是無論如何，歷史研究的職能，決不只是把許多的個別事件羅列在一起，作一些表面的敘述，就算了事。斯大林在其“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著作中指出：社會發展史，首先是生產發展史，是物質資料生產者的歷史，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的歷史。歷史科學的首要任務，是要研究和揭示社會生產的規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規律，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因此，歷史研究必須透過許多極其複雜的表面現象，去深入地探究其內部的聯繫，發現其內部規律，闡明這些規律的客觀性質。這就須要進行巨大的理論的綜合與分析，把許多個別的事件提到理論上來加以闡明。這就是歷史科學的責任。現今資產階級歷史學者，除了偽造歷史，就始終只能在歷史的表面現象上打圈子，這是資產階級學者無可改變的思想貧乏的表現。

努力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努力掌握大量的歷史資料，就是蘇聯史學家在工作方法上的基本經驗。

30幾年來，蘇聯歷史科學的經驗是極其豐富的。中國史學工作者須要努力學習蘇聯歷史科學的先進經驗，學習它們已有的一些重要結論，特別是斯大林關於蘇聯史方面的意見和結論；了解它們那些觀點是正確的，那些是被批判的；並且熟悉它們的工作方向和工作方法等等，來幫助我們有效地加強中國的歷史研究工作。